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 Le Printemps, 2017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7（春）

高宣扬◎主编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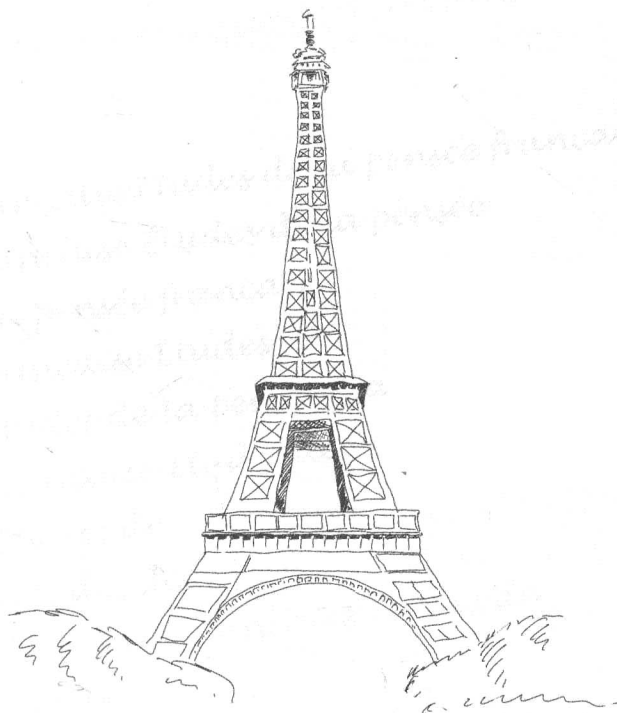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 Le Printemps, 2017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7(春)

高宣扬◎主编

姜丹丹 邓 刚◎执行主编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7(春)/高宣扬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
ISBN 978-7-01-019341-0

I. ①法… II. ①高… III. ①哲学-法国-文集 IV. ①B56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6123 号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7(春)

FALANXI SIXIANG PINGLUN 2017(CHUN)

高宣扬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70 千字

ISBN 978-7-01-019341-0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本期通过三大专题:(1)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古希腊哲学,(2)艺术哲学,(3)作为教化之哲学,试图展现当代法国哲学对自身生命的一贯关怀以及对环绕其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反思性批判态度。

真正的哲学,总是以源于自身生命的内在强烈创新欲望,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哲学生命自身的内在创新动力一旦展现出来,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正视环绕其存在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张力,并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动员生命内在的所有能力及其积蓄的经验,将环绕着它的各种外在因素及其相互张力,转化成哲学自身实现更新的优化条件。

法国哲学,特别是经历多世纪发展之后而成熟起来的当代法国哲学,之所以始终保持创新的活力,正是在于它不把自身当成单纯的知识体系或纯粹的专业性学科,同样也不把自身当做固定不变的现成存在,不把自身当成由各种抽象概念堆积的哲学理论体系,也不甘于沦落成自外于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的封闭性理念结构,而是始终置身于充满变易的世界之中,致力于自身生命活力的不断激发,使哲学自身的生命与其所处的世界融为一体,从而也使哲学思考的逻辑与世界变动的节奏之间产生共振性效应。正是这些共振性效应,向法国哲学家们持续提供思想创新的灵感。

在这种情况下,充满创新活力的当代法国哲学,一直把自身置于与他者以及与他国哲学相互对话的处境中。哲学的创新来自对话,来自它自身与自身内部各种创新要求的对话,来自它与他者的对话,特别是来自它与近邻存在的对话,与其自身的源初思想的对话。对于当代法国哲学来说,与近邻德国哲学的对话以及与其自身源初希腊思想的对话,乃是当代法国哲学获得一再重生的重要条件。当福柯探索“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s)和研究性史的时候,当德里达思考和批判语音中心主义而进行

“解构”的时候,他们都回溯到希腊。“回到希腊去”几乎成为法国哲学一再更新的一个动力,也表现出法国哲学力图保持同其自身本源思想紧密联系的倾向:这是一种试图从其自身本源思想中寻求创新活水的努力。

列于本期第一专题“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古希腊哲学”的首篇论文,是由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誉教授安若澜(Annick Jaullin)撰写的《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改造》,原文本是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针对法国19世纪哲学家拉维松(Félix Ravaisson)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安若澜教授深入分析法国哲学同希腊的思想传承关系。安若澜教授把“关注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有关的‘新精神’”,当成“一桩更新时代观念的哲学事件”(événement philosophique)。同时,安若澜教授还进一步说明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的关系,通过拉维松对德国哲学的研究效应,揭示法国哲学对于他者思想的创新原则,这就是要关注于“思想、方法的展开本身”。正如拉维松所说:“泛泛而言,我们要展示、要重构的不只是想法的主体或其根本,而是思想、方法的开展本身,一言以蔽之,把作者的思考方式当作其学说来加以重构。所以我们应该深入那个让我们的分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转写的思想发展动态本身。”安若澜由此强调指出:“拉维松感兴趣作者的‘义理’,也感兴趣其‘方式’,这引导着他进入运思本身进而‘转写’义理。”

显然,交流是哲学创新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交流意味着互动,意味着交流各方对各方活生生运思过程的关注,意味着哲学思想自身的生命力的重建和更新,也意味着在交流中交融形成的哲学命运共同体的创建及其生命延续过程。

法德两国是欧洲的主要国家,也是欧洲文化和思想,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创造基地。法德两国哲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

法德哲学是欧陆土地上长成的两株思想奇葩。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两国哲学思想始终以其各自独立的创造力量和独特的风格,在相互争艳和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为推动整个西方哲学和人类思想的发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德哲学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古罗马时代,也即整个中世纪历史时期内,法德两国哲学就已经在双方吸取同一思想源头的同时,开展了水乳交融的思

想对话。

因此,从两国的最早历史形成和发展脉络来看,两国由于都共属于罗马帝国而接受了由罗马人所传承的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世纪漫长的欧洲文化的融合过程,更使法兰西和日耳曼两大民族的文化,在罗马和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洪流中,在罗马帝国所传播的拉丁语言的基础上,通过宗教和语言两大渠道的汇合,交互融合、彼此影响。

由此可见,两国哲学的最早理论根源,都共同地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及哲学思想。对于两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和文化传统,究竟以何种方式以及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而演变成西方目前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多样的思想体系。

法德两国哲学,各自生长在不同的民族国土上,立足于两种相异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基础,以各具特色的语言论述形式,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表达模式;但同时,由于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和文化,具有共同繁荣发展的强烈愿望,在长期曲折的演变中,特别是从启蒙运动开始,就积极地相互交流和相互竞争;双方既相互批判,又相互借鉴,为当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仅输送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和精神力量,而且也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自主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典范模式。

正因为这样,当代法德两国哲学的交流及其相互影响,不仅对于理解两国当代哲学的特征及其发展逻辑,而且,也对两国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甚至对整个欧洲文化及思想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代法国哲学的创造精神及其伟大成果,已经引起西方哲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充分注意,人们在探究当代法国哲学的性质的同时,也不得不注意到:在散发魅力的当代法国思想中,隐含着德国哲学的浓厚气息;那些在德国哲学中潜在的深刻思想,一旦被法国哲学家掌握和加以适当改造,就转变成成为富有理论与实践双重威力的新哲学体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当代哲学史上,法德两国哲学的交流关系,同以往所呈现的历史表现形式相比,发生了新的有趣变化,显示了其特殊的意味深长的内容和逻辑。这一重要现象对于处在全球化和迫切寻求全球文化生命共同体的现代人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论题。

其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德国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

这个论题,一直是法国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思考对象。这一讨论本身,已经直接成为当代法国哲学不断推进的一个重要动力。各个学派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论,有利于深入理解当代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重建及其未来的展望前景。

德里达曾经说:“关于法德关系问题,不仅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60年代时期是决定性的,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种非常复杂的交织关系。而且,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公开的和掩盖的政治游戏,其中渗透着关于民族、民族主义传统、哲学和理论上的各种问题。当然,所有这些,都还穿插着两国大学制度的民族特殊性,也包含着这个教育制度中教学职业上的计谋方面的民族特殊性”(Derrida/Roudinesco, *De quoi demain....*, Dialogue, Paris, Fayard/Galilee, 2001: 35)。德里达的上述论断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揭示了德国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的复杂内涵及其政治的、文化的和历史的深远意义。

同德里达一样,福柯也多次重申德国哲学对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的重要影响。福柯在谈到他的创造性思路时指出:正是“从黑格尔和谢林开始,人们才试图在基督教之外重新发现希腊的思想,而这种努力,后来又在尼采那里再次表现出来。所以,像尼采那样,我们今天又重新思考希腊的思想;但这并不是为了发现在希腊的道德中所存在的道德价值,似乎以为这些因素是我们进行思考所必需的。与此相反,这是为了使欧洲的思想,能够在希腊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发动,并由此获得彻底的解放”。接着,福柯还强调:“海德格尔对我来说始终是最重要的哲学家。我开始的时候,是阅读黑格尔,然后马克思,接着我读海德格尔;那是在1951年到1952年,或者是在1953年,总之我记不清楚。然后我读尼采。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当初我读海德格尔时他对于尼采的注解(我记下了一大堆海德格尔的注解)。我从海德格尔那里所记下的注释,比我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记下的注解,对我来说还要重要得多。我之所以成为哲学家,阅读海德格尔是决定性的。但是我承认,是尼采这个人,才让我得到海德格尔。……我的整个的哲学变化过程,都由阅读海德格尔所决定的。但我承认,是尼采把他带来的。……很有可能,如果不读海德格尔,我就不懂如何读尼采。在50年代,我试图阅读尼采,但尼采单独一个人,似乎对我没有说出任何东西,一旦尼采和海德格尔连在一起,就立即造成了哲学上的震

荡。当然,我从来没有写过关于海德格尔的文章,也只有很少的文章论述尼采。然而他们却是我阅读最多的两位哲学家”^①。

福柯还说:“当我在五十年代仍然是大学生的时候,我读过胡塞尔、萨特和梅洛-庞蒂。……尼采对我来说,曾经是一种启示;当我读尼采时,我发现他同学校所教给我知道的所有作者都不一样。我以极大的热情读尼采,使我中断了我以前的生活,我也因此辞去了我在精神治疗医院的工作,……正是通过尼采,我才完全变成另一个人。”^②

许多当代法国哲学家都确认:德国哲学为法国哲学家重新思考哲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启示。福柯曾经深刻地指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从18世纪末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特点就在于:哲学探讨的重点不再是传统哲学的老问题,诸如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人?真理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怎样才能认识知识,等等;但现在哲学思考的重点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我们自己究竟是谁?”正是康德,首先在他的文本中概述了这个问题。福柯认为,只有从康德开始,才深刻地总结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把它归结为:“今天的我们,究竟是谁?”^③

福柯肯定:从康德以后,近代哲学一直试图对我们自身进行历史反思。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都试图沿这个方向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正因为这样,福柯承认自己的思路属于这个路线。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是通过以下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通过对于精神病、精神治疗学、犯罪现象以及惩罚手段的研究,我试图指出:我们是通过对于某些犯罪和犯精神病的其他人进行隔离的手段而间接地建构起我们自己。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我还要研究:我们自己究竟采用哪些关于自身的道德技术手段、而由我们自己来建构我们自身的身份?这样一种由自己建构自身身份的技术,也可以称为一种对于个人进行统治的政治技术;在西方,它是从古到今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技术。”^④

接着,福柯针对他所始终关注的“真理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也同样明确

① Foucault, M. Dits et E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 IV, pp.455, 702-704.

② Foucault, M. Dits et E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 IV, p.780.

③ Foucault, M. Dits et E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 IV, p.814.

④ Foucault, M. Dits et E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 IV, p.814.

地说:“在近现代哲学史上很少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只有海德格尔和拉康是例外。但同拉康相比,海德格尔就更深刻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①

没有与德里达和福柯走在同一条思想道路上的利科(Paul Ricoeur),也从另一个角度承认,对他来说,他的思想和著作都或多或少打下了德国哲学的烙印。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法国的角度接受胡塞尔的德国现象学、雅斯培的存在主义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②

总之,当代法国许多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从德国哲学理论宝库中汲取思想养料,得到深刻的启示,以至可以说:在近半个多世纪影响着法国哲学的外国哲学中,德国哲学是占据首位和最显著的思想力量。

德国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是全面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当代法国哲学的一系列重大争论及其思想成果,几乎无法脱离德国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德国哲学的角度来看,德国近现代的几乎所有重大的哲学流派及其重要代表人物,都可以在当代法国哲学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中找到他们的烙印。从古典德国哲学、19世纪哲学到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凡是取得重大理论成果的,都受到了法国哲学家的重视,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

德国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的深刻影响,不是偶然的;这种影响经历了近四个世纪(从16到20世纪)漫长的历史准备,经历了长期交流、相互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即使是仅仅就黑格尔、弗洛伊德、尼采、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六位德国哲学的杰出代表对法国的影响而言,也要花费将近一百年的过程,相当于经历整整好几代人的接力棒竞赛游戏,真不愧为一段漫长艰苦曲折的历程。

以20世纪30、40年代后的情况为例,从被称为“第一代”的法国哲学家开始,即从庄·瓦尔、庄·依波里特、亚历山大·柯杰夫开始,到阿尔图塞那一代,再到福柯、德里达等第三代,共经历了五十年的工夫。从第一代被称为是“老师级”的历史人物到第二代,不但需要有一批有才华的继承人,而且还要具备成熟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条件,才能谱写出20世纪下半叶由当代德国哲学

① Foucault, *Hermeneutique du sujet*, Paris, Gallimard, 2001, p.182.

② 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诠释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所震荡的法国哲学大变革。

此外,还必须指出:德国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是在法德两国哲学和文化的双向交流的基础上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经历两国间的长期双向的文化和哲学交流,才有可能实现上述德国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强烈影响。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民族文化消化交流、消化学习和批判竞争的过程,经历了好几个世代的消化、理解和改造过程。

因此,在考察德国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时,不能不更一般和更广泛地探索法德两国哲学的相互关系史,而把德国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放在这样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

法德两国哲学关系史,从中世纪开始,中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到19世纪,发展到更全面的交流过程,直至20世纪,才达到成熟阶段。前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交往史;其间,经历了六大阶段,发生了两次转折性的变化。

(一) 第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到宗教改革

由于法国哲学在拉丁文化传统中原来所占有的历史优势,而后又在启蒙运动时期广泛地汲取了英国启蒙思想的优秀成果,使当时的法国哲学有可能以其强大的实践精神,直接推动整个欧洲的近代化进程,同时也以其批判原则促进了德国哲学的革新。与法国哲学相对照,当时在批判实践方面极其软弱的德国哲学,经历从理论方面缓慢地汲取笛卡尔的意识哲学和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的成果之后,才在19世纪上半叶,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的精心加工之后,以其独特的思辨能力和体系化的智慧,登上了西方哲学舞台的顶峰而显示其特殊的历史角色。

(二) 第二阶段是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

这一阶段的法国哲学,从蒙台涅(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到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伏尔泰(Voltaire, 1694-

1778)等启蒙思想家的哲学,伴随黑格尔所说的“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的拿破仑的东征,显然强烈地启发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创造。在充满实践批判精神的法兰西哲学的影响下,不仅德国哲学,而且也包括德国的文学艺术界,都在创作内容和思考方向方面,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更新局面。

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的理性主义单子论哲学,是这一时期德国哲学的创造性同法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第一个历史典范。在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显示出他一方面发扬笛卡尔理性主义精神的思考路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对笛卡尔哲学的超越,试图克服笛卡尔的直觉理性主义及其过分夸大主体意识的缺点。

莱布尼兹所开创的事业,只有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人物黑格尔那里,才有可能充分地实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德国思想的成熟表现形态,更是熟练地将自身的独创性同吸收外来影响结合起来,使德国哲学从历史上所处的弱势地位转化为理论上的强势力量。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者,康德首先一再地肯定当时法国哲学思想的强大威力,尤其高度估计法国哲学所隐含的人文精神。在法国人在巴黎巴士底监狱发动革命起义前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先后在里加发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康德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有三个外国人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牛顿、休谟和卢梭。而康德在谈到他的思想转折时强调指出:他从“前批判时期”到“批判时期”的转折,是直接受到卢梭的启发的。康德为此慷慨激昂地说,如果是牛顿启发他思考天上的星星的运转规律、而休谟使他从“独断论”的梦幻中清醒过来的话,那么,正是卢梭,使他懂得了人的尊严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康德甚至说,卢梭的著作教导他尊重最普通的劳动人民,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每个人都拥有的、不可让与的尊严。

在康德之后的黑格尔,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赞赏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将它比喻成东方正在升起的一轮红日,为世界和德国思想界带来了希望和创造性的力量。针对法国启蒙运动所颂扬的理性与自由,黑格尔深刻地指出:“人类自身像这样地被尊重,就是时代的最好标志;它证明压迫者和世俗上帝们头顶上的光环已经消逝。”

黑格尔在青年时代,当他还在图宾根大学与赫尔德林、谢林结伴读书的时候,为了在德国扩散启蒙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三人共同创办的杂志《米涅瓦智

慧女神》(Minerva)上,经常引介法国先进的思想及哲学研究成果。

当然,作为德国民族精神的最高理论总结,近代德国哲学,从它的最早启蒙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开始,主要是以其自身的创造精神作为基本动力,在充分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法国哲学和拉丁文化遗产的优秀部分,发挥了它对于外来思想影响的成熟而灵活的消化能力。这一切,为19世纪之后德国哲学对法国思想界的启示,做好了历史的准备。

总之,到18世纪末为止,法德两大民族呈现出根本相反的精神面貌:法国人正忙于进行史无前例的社会政治革命,而德国人却以理论思辨的形式,创造了无以伦比的宏伟思想体系;当法国人积极地从事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的时候,德国人却以晦涩的逻辑语言从事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论诠释。

(三)第三阶段是19世纪上半叶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实证主义和心灵主义等重要流派的交流,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基础,为20世纪法德两国哲学的交流及相互理解创造了稳固的前提。

(四)第四阶段是从1870年到20世纪初

第四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方面,法德两国各自进入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工业革命的新阶段,两国思想家需要经历一段深思的过程,对本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重新进行反思;另一方面,经历近半个世纪艰苦思辨而创立的德国古典哲学,尽管取得了辉煌的理论成果,也需要给予思想家们一个缓慢的消化过程,才能使他们真正地分辨出其中的深刻道理,并从中发现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积极动力因素。

对当时的法国哲学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立即接受和消化德国古典哲学,而是根据本国思想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适应于工业革命后所发生的社会巨变的思想体系。所以,正当德国人急急忙忙诠释和继承刚刚死去的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的时候,法国哲学开始朝着有利于推动工业社会文明发展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圣西门和孔德着手奠定实

证主义哲学的基础。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几乎重演了启蒙运动时期英国哲学所演出过的精彩场面。也就是说,对于法国思想家来说,与其从社会改革起步较晚的德国吸收含有浓厚保守思想的理论思辨成果,不如借鉴同法国工业化步调较为一致的英国思想界的经验主义原则。所以,在这一时期,法国思想家反而更多地吸取了英国实证科学的精神,而对于充满思辨的德国古典哲学,仍然抱着冷漠的观望态度。

在这一时期,法国哲学对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的消化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同德国人以极大的热情试图复兴德国古典哲学、而创建一系列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局面相反,在法国,只有少数一些人对德国古典哲学发生兴趣。

这是从两方面来说的。一方面,在法国哲学界存在着一批追随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家,他们试图同他们在德国的同人和兄弟们一样,掀起复兴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运动,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库赞(Victor Cousin, 1792-1867)、拉舍里耶(Jean Lachelier, 1832-1918)、李诺维耶(Charles Renouvier, 1815-1903)以及哈莫林(Olivier Hamelin, 1856-1907)等人。这群人对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诠释,只能在法国哲学领域中投下思辨形而上学的微弱阴影,对于在法国复兴形而上学传统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发扬法国意识哲学传统的本土心灵主义者曼·德·比朗(Main de Biran, 1776-1824)、若弗鲁瓦(Thomas Jouffroy, 1796-1842)和拉维松等人,较为成功地把德国观念论的某些成果吸收进来,创建了法国式兼有思辨和实证性质的新观念论。上述两股力量尽管没有在当时的法国哲学界掀起学习和复兴德国古典哲学的浪潮,但毕竟为19世纪末以后德国哲学扩大在法国哲学的影响创造了历史条件。

这一时期,在介绍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扩大其影响方面起着特殊作用的,还有著名的女作家斯泰尔夫人(Madame Stael, 1766-1817)。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兼思想家,在她的著名著作《论德意志》(*De l'Allemagne*)中强调:“哲学精神在本质上是可能普遍地传播于任何国家。但是,在德国却有这样一种反思的倾向,足以使整个德意志民族被当成最优秀的形而上学思考的民族。”歌德曾经为此豪迈地说:“如果德国的精神始终都对于法国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外来影响的话,那么,斯泰尔夫人的《论德意志》就具有史无前例的威

力,足以横扫因阿尔卑斯山高峰和古罗马偏见所造成的、横放在法德两国之间的障碍。”斯泰尔夫人是在1813年拿破仑在莫斯科战败后的第二年,在伦敦发表她的光辉著作的。拿破仑的失败促使法国人冷静地沉思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清醒的思想家,仔细地阅读和理解斯泰尔夫人的这部著作,并把它同1807年发表于柏林的费希特《致德意志民族的信》联系在一起,反思他们的德国邻居所表现的特殊民族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斯泰尔夫人的这部著作,是法国哲学消化德国古典哲学的漫长历程的一个决定性起点。

在斯泰尔夫人的启发下,库赞意识到对于法国青年一代进行形而上学思辨训练的必要性,因此,他力促法国教育的改革,建议在整个大学范围内建立哲学形而上学教育制度。库赞本人为了亲身体会德国哲学的思辨创造精神,在1817年亲自访问海德堡,并在海德堡大学亲自聆听黑格尔的哲学讲演。但是,长期对于德国文化传统的偏见以及法国哲学传统的顽强对抗,使库赞未能真正把握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精神实质。库赞从德国学成回国之后,在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以及担任公共教育部长时期,一直极力推广德国古典哲学。

在库赞之后,拉维松和李诺维耶前往德国,先后研究谢林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后来也成为了在法国推广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家。拉维松在1861年发表《法国十九世纪哲学》,强调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对于重建法国哲学的重要性。而李诺维耶则极力推广新康德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具有浓厚康德伦理学色彩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e éthique),他的著作《人格主义》(Personalisme, 1903)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影响。

(五) 第五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经历上一阶段缓慢消化过程,法国哲学在这一时期开始注意到德国哲学的创造精神。一方面,继续消化和吸收通过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所发扬的德国古典哲学,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具有浓厚反形而上学色彩的尼采、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值得指出的是,在沟通法德两国哲学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是柏格森。正是通过他这个焦点人物,法德哲学实

现了双向的交流:通过他,法国哲学既接受和发展了德国哲学传统,又反过来影响着德国哲学的发展;同样地,也正是通过他,德国哲学接受了法国哲学传统,并又反过来影响着法国当代哲学。

当柏格森着手创建他的哲学体系时,他不但考虑到法国哲学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也充分注意到德国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双重路线,他尤其注重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论哲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不仅如此,而且,对于法国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也是通过柏格森而实现了在法德两国之间的双向交流。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资源》(*Essai sur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英译本书名为《时间与自由意志》),实际上成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法国哲学源流。

(六)第六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这一阶段,主要发生了3H和3M的具有典范意义的重要事件,加速和加强了德国哲学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

首先,以法国人通常称之为“3H”和“3M”的德国哲学作为典范,集中表现德国哲学影响当代法国哲学的各种重要特征。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这三位以H字母为首而命名的德国思想家,是当代法国思想家进行思想和理论革命的直接启蒙者,常被法国人统称为3H,而强烈受到他们影响的法国哲学家则被称为“3H分子”。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从30年代起,引导法国思想家们更深入地思考“人”、“理性”和“意识”本身,从原有的传统观念和思想体系中挣脱出来。受他们影响的当代法国思想家,主要吸收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辩证法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及其对于人的生存和日常生活的关怀精神,更彻底地开展对于历史、社会、文化的批判,尤其深入开展对于西方传统形上学、理性主义及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批判。

正是由此出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期内,受3H思想影响的新一代思想家们,才能够进一步从另外三位被称为“怀疑大师”(法语原文3 Maîtres de soupçon 简称为3M)的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弗

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著作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同当时红极一时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想进行剧烈的争论,另一方面也酝酿新的创造和思想突破,从而造成了这一时期极其活跃的特殊历史局面,为60年代后的法国哲学和西方文化的又一次重要转折,奠定了基础。

3H和3M并不是同时代的思想家,而且他们的理论本来是存在很大的区别。但为什么这六位理论家的思想,会在同一时期中相互交错和相互补充地影响着法国相当大一部分哲学家的思路呢?要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必须结合当时法国历史和思想界的具体条件。

首先,是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法国社会和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面临着一系列危机,急需寻找恰当的思想力量,以便恰当分析和解决当时的危机。法国哲学学会主席贝尔纳特·布尔乔亚(Bernard Bousgeois)教授在为拙著《当代法国哲学导论》所写的序言中说:法国的社会和文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60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酝酿了极其深刻的危机。1968年的学生运动不过是这场长期累积的历史性危机的激化爆发形式。所以,他进一步指出:“法国在1968年的动荡,更多地导源于法国国内的原因,而且,更具有法国的特殊性质;更确切地说,这场动荡,比表面上所看到的,简直更明显地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原本导源于法国哲学中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即直接导源于它的命运本身。”^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先是黑格尔和胡塞尔,接着是海德格尔,出现在法国哲学家的视野之内。所以,最先应归功于靠科杰夫(Alexxandre Kojève, 1901-1968)、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 1907-1968)、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等人。他们从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开始,不但敏锐地发现了隐含在黑格尔和胡塞尔思想和方法中的积极因素,而且还创造性地找到了适用于法国具体状况的思想模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激发的社会和文化矛盾的暴露,法国思想家们将

^① 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H 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同“三位怀疑大师”的批判精神结合起来,导致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到 50、60 年代时期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的探索浪潮。应该说,当代法国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的研究兴趣,是由对于黑格尔哲学思想讨论所激发出来的。黑格尔著作的丰富意涵及其巧妙的辩证方法,使当代法国思想家的心胸和思路开阔起来,同时又激起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内在矛盾的思索。如果说在 1930 年以前,黑格尔的“辩证法”一直是作为贬义的概念出现在法国哲学界,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此前始终都未能引起法国哲学家的兴趣的话,那么,在那之后,黑格尔的辩证法就相反地变成了受到人们肯定的哲学概念。

对于黑格尔思想的探索,激荡起法国思想界对于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浪潮。这是历史对于理性主义的一种公正的评判: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扩大人们对于理性主义的观察视野(horizon),同时也启发人们更深入分析理性主义体系内部的各个支节和组成部分,人们在仔细地回味和反思它的同时,发现了其中存在的各种难点、疑问和矛盾以及局限性,不但没有重蹈 20 世纪的老黑格尔主义的覆辙,陷入对于绝对理性主义的崇拜,反而使人们大开眼界,延伸和扩大了理性主义本身的视野,进一步发现了理性主义所可能包含的各种因素及其潜在的思索方向,并引导人们反思存在于黑格尔理性主义与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批判精神之间的可能联系。关于这一点,依波利特正确地指出:黑格尔在向新一代法国人强调理性的同时,实际上也向他们暗示了走出理性的迷宫的道路,并使他们看到了转向理性界限之外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福柯在谈到依波利特时说:依波利特对他的最大启发,就是从黑格尔那里学会“越过哲学”和“逾越极限”的创造乐趣(Foucault,1994: I)。

深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对于法国思想界并非陌生。法国强大的工人运动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同马克思思想有特殊的关系。但从 19 世纪末起,马克思思想长期地被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官方意识形态窒息,而在法国,也曾经被法共的官方思想家们的僵化思想方法扭曲,以致造成法共以外的当代法国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误解。但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由科杰夫和庄·依波利特发动的研究黑格尔运动,打破了人们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单纯独断局面的误解,激荡起对于辩证法研究的狂热兴趣;同时,也推动着青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